

学林

论衡

# 欧洲的乔叟，无罪的乔叟

编译/史硅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古人的传记，也适用。我要对几百年前的某人发生兴趣，他/她到底能给我提供怎样的教益？对于六百多年前的英国文学巨子乔叟，在这个时代，他的生平传记至少存在一团阴影，和一种教益。

很少有中世纪的卷宗像1380年5—7月的一组文件那样受到文学学者的关注，这些卷宗涉及“英国诗歌之父”杰弗里·乔叟 (Geoffrey Chaucer) 和伦敦面包师的女儿塞西莉·肖姆佩恩 (Cecily Chaucapaigne)。

这组卷宗最核心，也是学者们争讼万端的一件，是塞西莉当年5月4日的放弃诉讼声明。这份声明记录在英国大法官法庭的密卷上，塞西莉免除了乔叟“所有与我的raptus有关的行动”的指控。由于缺乏更多的证据，因此自1873年发现第一份诉讼声明、1993年发现当年第二份诉讼声明以来，学者们都认为，乔叟要么确实存在至少诱拐的行为（不排除更严重的行为），要么是在处理这段关系时激怒了女方，令她使用这一指控以求乔叟重视。这样一来，乔叟也进入了“取消文化”的辐射范围。

不过事情有了新转机。近日，尤安·罗杰 (Euan Roger) 和塞巴斯蒂安·索贝基 (Sebastian Sobcecki) 两位学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文件中，找到了两份王座法院卷宗，澄清了二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新发现刊登在《乔叟评论》(2022年10月)上。他们将此案如今一共八份卷宗合在一起，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理解。两位学者确定，乔叟和塞西莉并非对立，而是同一阵营的：属于与塞西莉的前雇主汤姆·斯陶顿 (Thomas Staundon) 的法律纠纷中的同一方，斯

陶顿根据《劳工法》起诉了他俩。该法规和条例是为了应对1348年黑死病在英国大爆发后出现的经济困难而制定，旨在为有限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新的法规，打击工资上涨，并防止有人许诺以更优厚的条件挖走仆人。其禁止仆人在合同期限内无合理理由或未经允许离开主人；禁止新主人雇佣以这种方式离开的仆人。斯陶顿的诉讼正是基于此。塞西莉否认新雇主乔叟，为二人提供了最便捷的法律途径，以证明她是自愿离开斯陶顿的工作，而不是受乔叟胁迫或绑架 (raptus) 才为其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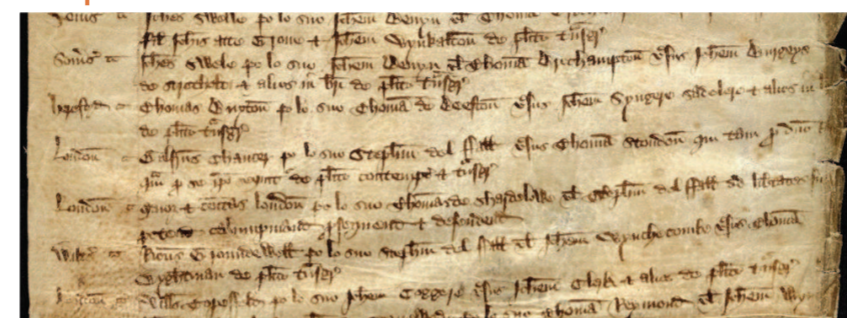
根据乔叟生平，他在1380—1381年间财务吃紧，还卖掉了父亲的房子。这段时间他也在写作圣塞西莉亚故事（《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位修女的故事）的草稿。曾有人猜测，长诗中罗马的殉教少女圣塞西莉亚，就是按照塞西莉的形象描绘的。

乔叟一直在被重新“发现”，近来犹甚。《坎特伯雷故事集》的风趣戏谑被认为充满了“英国性”。“还有哪个英国人比乔叟更英国？”这一看法从维多利亚时代延续至今。而两年前英国脱欧之际，牛津学者马里恩·特纳 (Marion Turner) 特地提请大家注意乔叟身上的“欧洲性”——是他的国际主义而非民族主义缔造了《坎特伯雷故事集》。

乔叟如他同时代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一样，掌握多种语言。他爱读古代晚期哲学、阿拉伯科学论文的拉丁文译本，还有法国爱情诗。他精熟于意大利语，游走亚平宁半岛，接触到了但丁、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最新诗作。事实上，乔叟对语言的迷恋是一种欧洲现象。但丁和薄伽丘拥护托斯卡纳方言，激发了乔叟试用自己的方言做些什么。

特纳说，《坎特伯雷故事集》从人

物原型到故事背景，都基本与英国无关，而是横跨了中亚、叙利亚、意大利北部直到佛兰德斯。一群人讲故事的形式，尤其模仿了薄伽丘的《十日谈》。特纳表示，虽然乔叟服务于王室，得以经常出国游历，但他其实不需要出国也会有国际视野，因为英国的商贾和贵族文化是深具欧洲特色的。乔叟来自一个葡萄酒商之家，英法贸易是其家庭财富的来源。他的出生地，伦敦 Vintry



▲ 乔叟画像，出自托马斯·霍克利夫 (Thomas Hoccleve)《王者之治》镜鉴手抄本，约1400—1450年

均资料图片

Ward，是城中移民最多的地区。乔叟打小就眼望着泰晤士河上的船只来来往往。印尼的香料、俄罗斯的毛皮、意大利的玻璃和纸张、波罗的海地区的木材、谷物和金属，在14世纪末伦敦的市场和商店里都能买到。

特纳想要强调，正是在欧洲文学的熏陶下，乔叟的想象力飞速发展，超越国界——与其称他为英国文学之父，不如称颂他为一个伟大的欧洲诗人。



## 中国武艺岩画

郭玉成

我国的武艺岩画作为刻绘在岩壁上的图像，是反映从史前社会时期到封建社会时期社会变迁、经济盛衰、宗教信仰、审美观念等的重要历史见证，具有宝贵的文化价值。

中国武艺岩画受中国复杂的地理环境条件、地域文化特征所影响，形成了北方、中原、西南、东南四大区域。北方武艺岩画主要分布在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等地区；西南武艺岩画主要分布在广西、西藏、青海、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东南武艺岩画主要分布在江苏、浙江、福建等地区；中原武艺岩画主要分布在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区。北方武艺岩画体现了人们狩猎、游牧的生活内容。西南武艺岩画凸显了人物活动，且色彩色彩浓厚。东南武艺岩画较少，以自然崇拜或渔猎题材为主。中原武艺岩画可能与军事布阵、指挥作战有关，有待进一步考证。中国武艺岩画与地域历史文化存在紧密且复杂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地域历史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影响武艺岩画的形成与创作；另一方面，武艺岩画通过题材内容等艺术形式，再现了地域历史文化的基本面貌。以文化分层理论为基础，将武艺岩画与不同地域的武术文化展开对比分析，发现在武术的物态、行为、心态等不同文化层面，均有明显传统关系，显示出地域文化对武术文化的深远历史影响。

中国武艺岩画受到原始思维的影响，在原始宗教的推动下融入各式各样的祭祀活动中，并在人类观察、学习、模仿自然万物的过程中，衍生出象形思维，影响了象形思维的产生与发展。基于万物有灵论的原始宗教思维，是人类童年时代世界观的产物，以此为思维基础而产生的符猎巫术、战争巫术和祭祀巫术，以极具实用性的功能仪式成为原始人类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对武艺岩画的历史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从符号学视角切入，以象形思维为主线，对岩画符号与象形武术的关系进行研究解读，会发现二者存在象形思维关联，岩画符号体现了中国先民的象形思维，象形武术是象形思维作用的结果。

中国武艺岩画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互动，促进了岩画的多样化发展，丰富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内容，也印证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成的历史缘起与发展历程。通过运用图像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分析不同民族对武艺岩画的历史文化影响，会发现不同民族的活动方式与内容影响了武艺岩画的创作与表现。武艺岩画所具有的记录、传播、传承等功能也彰显了不同民族的精神生活内容。中国武艺岩画与中华民族精神产生在联系的机理表现为：先民从社会生产与实践孕育中华民族精神，武艺岩画则是先民表现其精神世界的重要形式，而中华民族精神影响了武艺岩画的创作。此外，通过对世界各地武艺岩画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中国武艺岩画特征的形成与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存在紧密关联。中国武艺岩画与国外武艺岩画相比，在题材内容、制作手法、艺术观念、精神内涵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

（作者为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 格扎维埃·阿莱谈——法国的中亚研究

施越 李羽娜

格扎维埃·阿莱 (Xavier Haliez) 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土耳其、奥斯曼、巴尔干和中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法国中亚研究所研究员。熟悉掌握俄语、英语、哈萨克语、乌兹别克语等语言的阿莱长期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开展研究，有着丰富的档案阅读和田野调查经验。

2022年10月26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邀请阿莱研究员做题为“法国的中亚研究”的线上讲座。

### 近代以来法国的中亚研究

法国对中亚的研究最早始于法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兴趣。早期的代表人物巴泰勒米·德埃贝洛 (Barthélemy d'Herbelot, 1625—1695) 出生于巴黎，曾就读于巴黎大学，潜心研究东方语言和文献。德埃贝洛穷毕生之力编纂《东方丛书补编》。该书在17世纪奥斯曼学者卡提普·切莱比 (Katip Celebi) 的百科全书《东方丛书》索引基础上，汇编了其他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抄本信息，较为完整地收录了土耳其和中亚历史相关文献。在德埃贝洛去世后，法国东方学家安托万·加朗 (Antoine Galland, 1646—1715) 于1697年完成该书的编纂工作，并将其付梓。该书至今仍被法国学界广泛引用。

以今天中亚五国地理空间为基础，“中亚”概念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形成。法国学界对该地区的研究也是在这一时期取得较为显著的进展。东方学家、探险家和作家莱昂·卡恩 (Léon Cahun, 1841—1900) 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1878年起，卡恩赴地中海沿岸考察，搜集相关历史文献。1890年，卡恩在索邦大学担任亚洲历史教授，他的《亚洲历史导论》(1896) 对奥斯曼知识精英和20世纪的土耳其主义者产生深远影响。

随着全球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19世纪后半期以降，更多法国学者加入与中亚相关的研究中。雅克·巴科 (Jacques Bacot, 1877—1965) 代表了那些在旅行中产生学术兴趣、进而成为学者的东方学家。另一类是接受过系统性学术训练并掌握对象区域语言技能的人。他们前赴中亚地区，专收收集资料。其中包括许多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 (INALCO) 的学者，最为著名的就是东方学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中国学界对伯希和在华经历较为熟悉，值得一提的是，他曾走访位于今天吉尔吉斯斯坦南部的阿赖山区，拜访了当地有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物库尔曼江·达特卡。同时在场的还有时任沙俄总参谋部军官、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马达汉 (Gustaf Mannerheim, 1867—1951)。伯希和能与当时的吉尔吉斯人交谈，并拍摄了许多珍贵的照片。他留下的文献对于理解一百多年

前的吉尔吉斯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法国中亚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就是搜集和整理伯希和与吉国相关的档案文件，并翻译为土耳其语和俄语。

二十世纪中期，受二战和之后冷战影响，法国学界难以进入中亚地区开展实地考察，当时了解和研究中亚地区的方式只有学习该地区的语言以及研究历史文献。这一现象在客观上有助于法国东方学传统的存续，使得以语言文学为基础的中亚研究得到发展。路易·巴赞 (Louis Bazin, 1920—2011) 是二十世纪中期这一传统的代表人物。他曾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1990年代担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 东方语言和文化部主任、法国乌拉尔—阿尔泰学会副主席。另一位是吉尔贝·拉扎尔 (Gilbert Lazard, 1920—2018)，法国语言学家和伊朗学家，曾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波斯语教授，1972年在巴黎大学建立了伊朗学研究所。可以说，二十世纪中后期法国中亚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是东方学传统下的语言、文献和历史研究。

这一时期，法国中亚研究的另一条学术脉络是冷战时期苏联框架下的苏联民族问题研究，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本尼希森 (Alexandre Bennigsen, 1913—1988)。本尼希森出生于沙俄圣彼得堡的德意志贵族家庭。1924年，本尼希森一家辗转移居至巴黎。求学期间，本尼希森曾于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伊朗语言文学。二战时，他最初作为军官加入法军，并参加了法国抵抗运动，战后一度在总理府任职，负责整理涉及苏联的档案文件，后任教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他于1961年创立了俄罗斯、东欧和土耳其研究中心，同时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对冷战时期美国的苏联研究学界也产生一定的影响。阿莱认为，本尼希森的两部作品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一是关于中亚苏非主义传统。苏联研究框架下的民族问题研究是当代法国中亚研究学术史中的重要部分。

### 当前法国主要的中亚研究机构

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档案资料的公开以及田野调查条件的



▲ 德埃贝洛穷毕生之力编纂的《东方丛书补编》(1776年版)。该书至今仍被法国学界广泛引用。

改善使我们有机会重新思考此前理解中亚所用的范式。而19世纪和20世纪一方面有着丰富的俄文和本土语言文献留存，另一方面还有规模可观的民族志文献，中亚地区的现代转型因此成为吸引欧美各国学界的重要议题。当前，法国学界涉及中亚研究的主要机构如下：

俄罗斯、高加索和中欧研究中心 (CERCEC) 前身是由本尼希森于1960年代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立的俄罗斯、东欧和土耳其研究中心。1995年，该中心被拆分为两个机构，一个侧重于研究突厥语族人群，另一个侧重于研究以俄语为基础的族群及空间。后者于1999年转隶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且在2001年成为联合研究单位。2004年，该机构更名为俄罗斯、高加索和中欧研究中心，故而相对较少关注中亚地区。该机构管理法语学界最重要的俄罗斯研究期刊《俄罗斯世界文汇》(Cahiers du Monde russe)。

土耳其、奥斯曼、巴尔干和中亚研究中心 (CETOBaC) 如上所述，该中心于1995年从本尼希森建立的研究机构中析出，独立之初的名称为土耳其和奥斯曼研究中心。2010年，该中心改用当前名称，中心倡导跨学科研究，关注以下六个领域：奥斯曼史，当代土耳其研究，当代巴尔干地区研究，中亚和高加索研究，操突厥语族人群的语言、文化和社会，苏非主义。该中心是法国极少数长期开设中亚研究和中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的高



▲ 《俄罗斯世界文汇》(2022年4—6月)

等教育机构。此外，鉴于伊朗文化对中亚历史的深刻影响，伊朗世界研究中心 (CERMI) 同样可以被视为法国中亚研究机构的一员。该机构于1995年由巴黎的三个研究单位合并而成，侧重于操伊朗语族人群的语言、历史和社会文化研究，通过位于德黑兰的法国伊朗研究所 (IFRI)、位于比什凯克的法国中亚研究所 (IFEAC) 和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法国考古代表团 (DAFA) 维系国际学术网络。

区域研究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的推进需要强大的语言教学资源支撑，而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正是法国各区域研究机构在这一方面的共同基础。该学院自1795年开始专业从事东方语言和文化的研究，目前教授包括波斯语、阿拉伯语、汉语等96种语言，拥有来自120多个国家的学生和教师，并在100多个国家开展研究项目。前文所述的一系列重要学者，包括巴科、伯希和、巴赞、拉扎尔、本尼希森及阿莱博士本人都曾在该机构学习。

最后，法国中亚研究所是法国区域研究体系中保证在地知识供给的关键环节。法国外交部自1907年开始在海外开设“法国学院”，旨在提升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该体系下设以文化传播为主要目标的法国文化学院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目标的法国研究所两类。后者由外交部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管理，在全球设有14个以对象国或地区命名的据点，包括位于突尼斯的现代马格里布研究

所、位于曼谷的现代东南亚研究所、位于埃及的法国东方考古研究所等。法国中亚研究所正是其中之一，最初于1993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2010年转移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其主要任务是为在该地区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各国研究人员提供学术资源服务。值得一提的是，法国中亚研究所服务的对象范围不仅限于法国公民。自建立以来，该机构成为许多欧洲国家学者赴中亚国家开展档案研究或田野调查的重要渠道。其服务的对象对象地空间以当代中亚五国为基础，同时关注邻近国家（俄罗斯、中国、阿富汗、伊朗和蒙古国）的接壤地区。法国中亚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与当地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学术活动，为法国与中亚各国的人文社科各领域合作提供平台，推广法国学界的国际影响力。法国中亚研究所长期运营英法双语的学术期刊《中亚文汇》(Cahiers d'Asie centrale)。

讲座最后，阿莱提到，自己最初对中亚地区感兴趣，是由于青年时代阅读了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 (René Grousset, 1885—1952) 的《草原帝国》以及伯希和关于中亚地区和蒙古高原的作品。而在就读本科期间，阿莱见证了欧亚地缘政治剧变。中亚国家的开放和大量档案资料的公开激发了他投身中亚研究的热情。

为深入这一领域，阿莱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生活两年，以充分掌握俄语和哈萨克语，之后赴俄罗斯开展博士论文写作所需的档案研究。他的研究方向受到了亚历山大·本尼希森作品的影响，以苏联东方民族的主要知识分子为关注焦点。他选取了苏丹加利耶夫、雷斯库罗夫和仁钦诺三位历史人物为案例，通过对苏联时期的中央和地方档案资料，观察和分析不同族裔、地域和宗教背景出身的东方革命人物对共产主义与身份认同的思考。

受法国学界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阿莱此后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对哈萨克斯坦近代历史的研究，关注部落在中亚草原地区近代政治和社会结构变迁中的作用。他还长期关注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在独立后对各自国家历史的建构，尤其是1916年中亚大起义在其中的角色。

在被问及当代法国中亚研究学界是否与英语学界存在差异时，阿莱坦诚地表示，两者在方法论层面并没有显著的差异。相比英美同行，法国学者更注重以法语发表论著，且更容易与其他领域的法国学者形成学术共同体。因此，就中亚近代史和当代中亚问题而言，法国学界可能更倾向于结合人类学和地理学的方法，探讨中亚地区近代以来的变迁和当下的状况。